

“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反思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任 昕

内容提要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后期西方一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所形成的具有相似倾向的理论观念和理论现象。其中一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形成了这股思潮中的中坚力量。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更多是否定的而非认同的，解构而非推进的，这使他们最终无法认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后马克思主义”，毋宁说是后现代主义。

关键词 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①，界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我们的重要任务。在我看来，“后马克思主义”并非指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或流派，也许更合适的说法是，它泛指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和现象。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个有着共同旨趣和组织的群体，而是那些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关注、以自身立场和态度进行研究或表达见解、试图在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读的西方学者。所谓“后-”，既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种种称呼相区别，也可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之“后-”暗合。它既可看作时间上的一种“后”发生，也可看作思想上的一种否定，一种“之后”对“之前”的否定。正如“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与颠覆一样，“后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上也可看作是一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逆动。

本文试图对“后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进行探讨，分析其解读背后的理论起点和思考结果，并试图理清“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或背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这些“后马克思主义”思想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02版。

家们都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大潮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不约而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兴趣和关注，至少在最初是这样；而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时又都不约而同表现出共同的倾向；同时，由于他们在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和地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无疑受到广泛关注，并传播甚广。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带有一定共性，形成了一种理论现象。

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和视角进行的，其解读方式同样是后现代的，这种后现代式的解构操作将马克思主义同他们所能用来解读的其他思想或文本一样进行了否定和颠覆。由此，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构性解读，而不是建设性解读，是一种否定性姿态，而不是正面回应。在主要思想观念方面，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怀疑、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大体说来，“后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以下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解读往往遵循着这样的路径：起初，他们中的不少人出于兴趣，有些人甚至出于热望去接触马克思主义，但这种兴趣和热情大都出于自由批判的立场，很快便表露出强烈的质疑，进而发展为否定、批判，并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福柯在1951年脱离法国共产党之前，从来都不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圈子中的重要人物。福柯的年代正值法国一代知识分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感到幻灭之时，也正值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时期。他以一种游离而批判的态度关注着马克思主义，这种态度决定了他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时采取的必然是一种怀疑和解构的姿态。福柯曾明确宣称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在认定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怀疑式的解读了。在对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评价中，福柯即表达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解决人类总体性问题的宏大观念的怀疑，这已是一种典型的后马克思主义态度了。同样，作为“社会主义或者野蛮”小组成员的利奥塔，几乎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表示质疑。20世纪50年代，他在为《社会主义或者野蛮》杂志所撰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文章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并不适合像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模式强加给所有国家。70年代，利奥塔更是公开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

与福柯和利奥塔不同，德里达从一开始即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热情和支

持。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他宣称“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①，对马克思主义表达了明确的支持和信心，他甚至极力反对福山式的共产主义失败论。1976年，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是以后现代方式进行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并非要坚定不移地维护马克思主义原典和基本内容，而是正好相反，是要以多元方式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应该是“复数的”，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②，只有“复数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当今解释多种问题。在德里达看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方式是给予马克思主义当代的、新的、多重的解读。而这种多元方式正是后现代主义者们解构传统的一个典型方式。

其次，后现代主义否定和对抗现代性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对一切启蒙主义式的宏大叙事的否定和消解，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马克思主义学说正是宏大叙事的典范。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互作用模式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思路表示出极大怀疑，进而通过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有序性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福柯在《词与物》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历史是从经济学、人类学角度出发对历史的设定，这是大写的历史，是典型的宏大叙事，并被作为普世性理论广为信奉。对此，福柯表示了极大怀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将人锁定在历史中，使人成为历史中的存在物，历史也因此成为一种控制论的体系。这种对待历史、对待人的态度仍然是启蒙主义的。福柯把马克思主义置于19世纪的历史环境中，认为马克思是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如今，他与他那个时代一样都已经被取代了。在福柯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在本质上并无真正差别。李嘉图认为人类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经济的不停增长最终将会导致人类发展的极限。而马克思的论断则相反。根据马克思的设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将会导致阶级斗争和政权的变更，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社会主义国家无异于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尽管这一乌托邦构想与李嘉图的悲观主义预测完全不同，但在福柯看来，这其中并没有根本差别。如果按照李嘉图的预测，那么我们的历史将会出现一个大写的静止不动的历史，而如果我们遵循马克思的理论，那么即使我们废除了一个大写的历史，也将会出现另一个新的大写的历史。这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②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15页。

只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而它们的立论都取决于19世纪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状况。因此，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存在于19世纪历史条件中，它在其中如鱼得水，而在其他任何地方则无法呼吸。福柯因此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他宣布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马克思被锁定在了他的历史时代中。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使得他原本就持有的怀疑态度和松散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最终走向放弃。

不仅如此，福柯还进一步否定了人的历史归宿，他对人类未来的预测是悲观的：“诚如我们的思想之考古学所轻易显示的那样，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可能正在接近其终结。假如所有这一切终将消失，正像它们曾经存在过那样，假如某个事件终将导致其毁灭，而我们既不知道它以何种形式发生，又不知道它确切是什么，但我们能够感知它的到来，除此外我们无能为力，就像18世纪末古典思想的基础所经历的那样——那么，人就能肯定地打赌：人终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画着的一张脸。”^①

福柯的这种反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远景的乐观的、宏大的构想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幸福理论如此反感。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启蒙不过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知识妄想的事实。我们总是觉得，正是从启蒙时期开始，人类将其精神、信仰、人的权力等从蒙昧状态和奴役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如此看重人类思想的启蒙，然而它果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吗？不仅福柯，后现代主义者普遍对启蒙主义不抱乐观态度，有时甚至是轻蔑的态度。人类理想的宏大远景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不过是知识型社会的一种妄想，而知识型社会已经完结，未来不可预测，人道主义因而也不过是即将完结的幻想。

利奥塔在《回忆马克思主义》《力比多经济学》中认为，历史本是无序、无规律发展的，其进程不可测度、不可预期，影响和制约历史发展的是力比多，是力比多控制着人类历史的全部进程。这就是说，人类历史是无序而动的，甚至可以说是混乱躁动的产物，而不是辩证向前的、有规律的、线性发展的。他以此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学说。他说：“我们不再想要修正马克思主义，想要重新阅读他，或在一种小阿尔都塞者‘阅读资本论’的意义上阅读他，即按照‘它的真理’来阐释它。我们没有打算要秉持真理，去赋予马克思的真理，我们想知道在马克思那里拥有何种力比多，‘在马克思那里’意味着在他的文本或他的阐释中，主要在实践中。我们宁愿将他视为一件‘艺术品’。”^② 利奥塔的历史观是反目的论的，也更为极

^①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506页。

^② Jean-Francoes Lyotard, *Libidinal Economy*, trans. Iain Humilton Grant, London: Anthlone Press, 1993, p.95.

端，因此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力比多经济学》“是一部更尖刻并在许多方面并不公道的著作”^①。但利奥塔的看法也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看法。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人的发展不再是一个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人类整体发展总是向着一个最终目的前进的，但是，这个最终目的是否真实存在？后现代主义者对此表示极大的怀疑和否定。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发展并非是一个明确的、向着某一归宿前进的历程，而是一个无序进展的历程。马克思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分析在他们看来无疑是预设了目的和规律的，因而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真相。

第三，这种对宏大叙事的不遗余力的解构，也表现在后现代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学说、人类发展总体性理论、目的论的怀疑和否定上。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怀疑和否定与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怀疑和否定是相一致的，从实质看，是对人类社会最终目的能否实现的怀疑和否定。而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构想，也是其学说的落脚点。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性和共产主义的怀疑和否定，就等于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未来发展构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斗争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在未来必然消亡的预言的怀疑和否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进行的怀疑和否定。

鲍曼在谈及共产主义时，引用他者理论，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只能起到制约的作用，而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的解体不过是总体性秩序的一种失败。”^②普遍说来，后现代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抱持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不仅仅是因共产主义理论部分的乌托邦色彩，更因其本身的理论性质。他们首先对共产主义的内容普遍持不认同态度，其次，他们虽然也不遗余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并为资本主义前途深感忧虑，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战胜资本主义。这里就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道重要分水岭：既然“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同社会主义可以战胜资本主义，并且，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革命从其全球范围的实践看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威主义并正在走向失败，那么他们也就从根本上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了。

第四，后现代主义者试图以多元主义解释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者以多元视角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一切社会现象，也同样以多元主义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和元叙事。这种多元视角是后现代主义者看待一切事物的立场。他们从现代主义的启蒙立场中挣脱出来，总是力图摆脱启蒙立场的唯一性、权威性和宏大性。利奥塔在《回忆马克思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存在于我们的时代，并且始终没有消

^① 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9页。

^② Zygmunt Bauman,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177.

散。但是，这是一个多元主义的幽灵，它充满歧义，具有不可通约性。

同样，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也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无限的阐释。德里达最初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极大的热情，他承认自己受到马克思主义很大影响，也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但是，他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研究的。一方面，他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的经历”是“我以及我这一代人在我们的整个一生中所共同享有的东西”^①，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特有的“重构”方式相信并阐释马克思主义。他相信，在今天的人类历史发展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必然要以一种多元的视角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是可以而且必须要以多元的方式来解读和阐释的。这种观点听起来极为合理，似乎完全符合思想发展的逻辑，也完全符合当代社会中人们对思想体系的心理诉求。西方社会自20世纪后期以来，对其文化和思想史的整体反思和清算形成了一股巨大浪潮，冲击和影响了西方思想界及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正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浪潮兴起的背景原因。对一切传统、中心性、权威性 & 宏大叙事的消解，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任务的重中之重。在后现代主义的摧枯拉朽的解构运动中，人类思想中一切曾作为规范性的东西都被悉数列入其中。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多元主义视角带有一种极大的模糊性，它在一种要求思想开放的状态下模糊和消解了中心性和确定性。而那些曾经支撑了人类历史的中心性和确定性一旦倒塌，并没有随后建立起新的支撑点。偶像被破坏之后，西方思想界所呈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片虚无主义图景，这种图景甚至也影响到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在带给人类思想多元化的同时，也带来思想的失衡状态。

这种多元性、开放性和解释的多样化，使得德里达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明确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

马克思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

当马克思主义遇上后现代主义，或者说，当马克思主义被后现代主义者所思考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马克思主义会以怎样的方式被看待和阐释？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解读看作一种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的理论争论或学术研究，例如把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放在哲学范围内考察，把这一批判看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斗争的延续；也可以把马克思对资本运作规律的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15页。

揭示、对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及其本质的分析划定在对社会问题的学理讨论范畴内；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共产主义的现实性、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实践中究竟如何运作以及资本主义何时消亡等问题当作悬而未决的理论来继续讨论；我们还可以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必然会面临着新的、具体的、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或许我们可以以一种学术的、相对中立的立场，把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划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考察，例如划定在哲学的、思想史的、学术的范围内。但是，我们很快便会看到，即使我们采取学术的而非政治的、社会的视角，我们仍然需要作出更明确的判断。人总是持有一定态度的，人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是某种态度的产物。人对问题的讨论所反映出的首先是视角、态度、立场、出发点的问题，因其视角、态度、立场、出发点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结论；即使视角、态度、立场、出发点相同或相似，因其思维和论证方法的不同、过程的差异，也会得出不同结论。而方法论和过程分析显然又不全是思维方式多样化的问题，也同时是思维的根本立场的问题。因此，哲学立场的不同会在随后相应地导致理论结论的不同。后现代主义者因其从一开始即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以后现代主义思维来反思马克思主义，其结论必然是后现代主义的。而后现代主义是以反现代性为基本前提的，它所做的所有工作无一不以对现代性思想的颠覆为主旨，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恰恰符合现代性思想的一切特征，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必然走向否定性阐释。

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后-”环境中，我们会看到，后现代主义所持有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思想方法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可谓大相径庭，在许多方面甚至处于对立。马克思主义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解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并以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和批判。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未来规划了共产主义远景，并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方案，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及至人类摆脱剥削制度，达到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又是一种在实际生活中被实践了的理论，它对人类社会发生的深刻影响使得当今思想界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这一重大的理论现象。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者对此关注的根本原因。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它所针对、所思考、所批判、所要解决的是西方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症结。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显然带有深刻的时代印痕，它依赖于其后现代社会的历史条件、思想资源和话语体系，又囿于所有这些生成条件。当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社会阶段时，其经济、社会、政治各个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虽然同样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情批判，同样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

现实的深深忧虑，但是，他们所反对的已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所关注的问题了。后现代主义者所反对的是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传统、总体性思想、宏大叙事、启蒙主义的知识话语、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权威主义和教义的神圣化等。因此，他们不可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站在同一战线上批判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那横扫一切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使得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同样的虚无态度，“后现代主义标志着一种范式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总体性的权威遭到了拒斥，怀疑主义变成了文化的决定性特征”^①。

他们是从后现代主义立场，也是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对一个世纪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进行了新的解读。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思想特征和实践特征，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要极力怀疑、否定和对抗的。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首先，思想之存在显然不是为了一定要建构什么，更不是一定要建构一种体系、一种完美理想、一种制度或一种人类生活。那些试图为生活建立些什么的思想本身一定带有预设的假定，即假定思想本身具有一种能够拯救人类的能力，这种假定本身即带有乌托邦性质，而这种乌托邦性质正是思想本身对自身能力的一种妄想。其次，思想若想对大众启蒙，那么思想就假定自己拥有高于大众的认识，假定自己拥有可以向大众进行启蒙的能力。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恰恰是现代思想本身的顽症。现代主义思想以向大众启蒙为己任，而启蒙本身即带有思想的一元性及对自身中心性、权威性的过高估价。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政权以及其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后现代主义者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权威主义的产物。第四，马克思主义以人类发展为理论视野，以人类获得彻底解放为最终目的，这些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正是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而上述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后现代主义者所要否定的现代性特征。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恰恰是对解释性因素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才是那些质询的巨大魅力之所在，才是向日益对宏大叙事及其权威主义方法感到幻灭的那一代人所说的东西。”^②然而，在他们推翻现代性话语体系之时，他们也同时将话语的宏大叙事方式推翻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思想中的那些基础性的、涵盖面广、包容量大、视野广大、理论含义重大的部分同时推翻了，而其中可能恰恰也包含着人类思想中那些富有力量的部分。至于提倡以多元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表面看来是以多元主义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实际仍是一种解构运作。这种重构并非真正的建构。从表面看，多元主义以更加开放、不固守成见、不迷信权威的积极思维来重新给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思

① 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第162页。

② 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第167页。

考,但是,这种多元主义解读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前提下进行的,即以多元主义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失去了其原有基础内核的散漫的理论,也因此成为非马克思主义。这种重构实则等同于解构。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德里达拒绝接受关于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那里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差异。……毫无疑问,解构主义提供了摧毁机械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概念,这种决定论思想是很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①当代多元主义带给我们这个世界太多的变化,在带来消解权威、促进思想多元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和思想的变通发展,另一方面也摧毁了曾经的确定性,这些确定性既包括了既成规定、权威主义、僵死的条文,但也同时包含了那些经过历史选择而存留下来的人类思想遗产、社会行为传统、价值标准、真理标准、善恶标准、思维方式等。

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否定,不是简单的理论观念的不同,实则是根本立场的差异。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者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宁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观点来看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理论观点来批判),并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他们从来不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因而他们不可能、也从来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换一种问法:“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对此,我们也可以给出明确的回答:“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后现代主义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它不仅在基本观点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在其理论立场、研究方法上,更是后现代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同。后者仍然基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立论,试图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社会问题面前对马克思主义予以补充、修正或有所创新。无论其结论如何,角度如何,研究方式如何,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始终在努力维护马克思主义,借助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在基本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典和初衷。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可归为“推进型”研究。而在此一点上,“后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推进,毋宁说是“否定型研究”。它更是后现代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起来就像是另一场解构的盛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苏玲

^① 罗伊·博伊恩《福柯与德里达:理性的另一面》,贾辰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